

俄羅斯政黨發展與政治民主化

郭武平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初期，曾出現過短暫的多黨制，但一九二一年後即形成俄共一黨專政統治。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展開「改造」工作後，擴大政治「民主化」，取消蘇聯憲法中一黨專政的法定地位，蘇聯一黨專政的歷史告終。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將國家達成民主的希望連接到葉爾欽個人身上。十年的改革，俄羅斯經濟雖迄未見好轉，但政黨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努力卻不容否認。西方國家尤其寄望俄羅斯能繼續朝向建立政治民主化的既定方向前進。

關鍵詞：改造、民主化、公開、杜馬

壹、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

列寧曾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¹依列寧進一步的解釋是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供大多數享受的民主制」專政，「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對窮人的民主，而不是對富人的民主」。²而窮人是居絕大多數的，由絕大多數的窮人當家作主的民主，才是列寧心中真正的民主，由此同時也可知道列寧所謂的民主有階級性，不同於一般西方學者的民主概念。

針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否是比任何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民主百萬倍的問題，當年與列寧論戰最激烈的考茨基（Karl Kautsky）的一段話，似乎最能一針見血指出問題所在。考氏指出：

¹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頁634。

² 同前註，頁635。

「若使專政的意義，我們不僅指一個統治權的狀態，還指一種政府形式，那麼專政意義，就指一個人的獨裁或一個團體的專政，不是指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指一個無產黨的專政，且由於無產階級分成幾個政黨，就使問題更加複雜，為此那些政黨之一的專政，就不算是無產階級專政，只是無產階級的一部份對另一部份的專政。」³

這句話說穿了，其實就是指少數的一部分人，打著無產階級的旗號，行那專政統治之實。易言之，也就是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不同的一群人，用無產階級的旗號，行那少數人專制統治之實。

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初期，曾出現過短暫的多黨制。但當一九二一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決議禁止派系主義後，即形成蘇共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的一黨專政統治。直到一九八五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後展開的「改造」(perestroika)工作，強調要復活列寧的社會主義，把民主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當戈氏爲了擴大政治「民主化」，進一步取消蘇聯憲法中一黨專政的法定地位後，乃加速終結蘇聯一黨專政的歷史。

本文所欲探討的就是近十年來，戈巴契夫與葉爾欽(Boris Yeltsin)主政下俄羅斯的政黨發展與政治民主化歷程。

貳、社會主義民主的改造

基本上，在蘇維埃一黨專政的封閉體制下，因制度僵化、缺乏活力，社會經濟長期停滯病入膏肓，因此經濟改革成爲當務之急。但依戈巴契夫的構想，在蘇聯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體制下，必須先完善社會主義民主，使人民積極有效參與解決國家社會生活問題，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才能推動經濟改造。」⁴因此在企圖改造經濟時，遇到政治改革的需要，其後戈氏始乃全力推動政治改革，落實「民主化」的「改造」。爾後戈氏實際推動的「民主化」改造，包括精簡政府機構與人事、修改選舉制度、落實黨政分離以及擴大黨內民主等工作。而這些都與俄羅斯政黨發展與政治民主化息息相關，當戈氏推動「民主化」的「改造」工作後才發現困難

³ 考茨基著，鄭學稼譯，*論無產階級專政*，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69年，第4版，頁25。

⁴ Mikhail S. Gorbachev, *Perestroika i Novoye Myshleniye dlya Nashey Strny i dlya Vsego Mira*, Moscow: Lzdatel'stvo polibicheskoy Literatury, 1987, p.28.

重重，在此扼要略予回顧。

一、黨政分離與黨內民主化

一九八五年十月，戈氏在蘇共中全會上提出「要進一步擴大黨內民主」。一九八六年二月蘇共廿七大，在戈氏主導下，打破歷年來蘇共代表大會那種刻板、教條、歌功頌德的議程，大會上出現批評的聲音。⁵這次大會是蘇共推動黨內「加深民主原則」「強化公開性原則」之始。一九八七年元月的蘇共中全會中，有七十七人登記發言，最後有三十四人發言，發言人均未經事先安排，每人所提問題都屬實際問題而非空洞口號，這種變化，對蘇共中央而言，是屬空前的，它同時也推動了蘇共黨內民主化的發展。⁶

一九八八年六月的蘇共第十九次全國黨代表會議，大會中心議題之一即是「黨政分離」，黨推動的「改造」工作自此次大會後，成為反意識型態與獨立運作的力量，連「改造」工作也不再經由黨去執行。

一九八九年東歐共黨國家紛紛修改憲法，放棄共黨一黨專政的法定地位，但截至同年十二月，戈巴契夫還是堅持不放棄專政，直到翌年他才鬆動了立場。一九九〇年二月的蘇共中央全會，推出新的政治綱領，同意修改憲法，廢除共黨一黨專政，確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制。這是戈氏推動「改造」政策後的一大轉變，也是列寧黨的根本質變。同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憲法修正案，允許多黨制的合法存在。三月人民代表大會也通過此議案，事實上，在這之前，蘇聯的多黨體制早已存在，只是未取得合法登記。如一九八八年五月成立的「民主同盟」，一九八九年在人民代表之間組成的急進改革者，以及「自由民主黨」「基督民主黨」，一九九〇年成立的「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均是。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日，蘇共舉行廿八次大會。當時葉爾欽甫當選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在會中主張將蘇共更名為「民主社會黨」，反對蘇共是政府中的政府角色，倡言以政黨政治取代整體政治結構，最後並在戈巴契夫的驚愕下公開宣布脫離蘇聯共產黨，威風凜凜地走出會場。而據當時法新社報導，從一九九〇年初起，蘇共就有八十九萬人以不同理由脫離共產黨。一九九一年四月蘇共中全會中，他又透露從一九八六年廿七大

⁵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XXXIII, No. 9 April 2, 1986, p. 2.

⁶ Mikhail S. Gorbachev, *op. cit.*, p.60.

以來，退黨黨員約四百萬人，黨員數剩下一千五百萬人。

廿八大大會後蘇共主動放棄在憲法中法定的領導地位，承認多黨制，結束馬列主義下「一黨專政」的歷史。加速蘇聯各種政治性社團的成立，推動俄羅斯走上政黨政治之路。

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後不到一週，戈氏宣佈解散蘇共中央委員會，並辭去總書記一職，自此蘇共全面潰散。

二、複數選舉制

如果要將戈巴契夫的「民主化」改造工作區分段落，複數選舉制的實施不失為一個分界點。因為蘇聯的一黨專政與民主化係屬不同領域。蘇聯推動複數選舉，基本上其民主理念已超越了「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改革。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蘇聯首度舉行與前不同的人民代表選舉。在這之前的選舉，只是一個職位一位候選人，候選人名單由蘇共中央決定，投票者只能在選票上劃下贊成與否而已。但是這次選舉，在二千二百五十名代表中，三分之一從區域選區選出，三分之一從民族選區選出，另三分之一分配給不分區代表。區域選區候選人人數超過應選人數，選民不但有選擇空間，更可圈選非共產黨員候選人。因此選舉結果，共產黨員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均遭到慘敗，在波羅的海三國也由「反莫斯科」的民族組織獲得壓倒性勝利。唯因當選代表大多仍係蘇聯共黨所指名安排參選，故其後在一九九三年國會與葉爾欽的政爭中，因仍具共黨與保守派的象徵，而致葉氏敢以大炮轟擊國會結束雙方經年之爭執。

蘇聯當時是在蘇共一黨獨裁體制下舉行這樣的「民主化」選舉。它並不是選擇一個執政黨系統，而只是選擇候選人個人；它不是政黨與政黨間勝負的選舉，如果將對於共產黨之政治組織做為一個主體而進行的話，那就超越戈氏擬議中單純的「民主化」複數選舉，成為複數政黨制的選舉，這是兩個根本不同性質的選舉。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仍屬前者，但其後在蘇聯出現反對黨，迫使蘇共廿八大主動放棄憲法中一黨專政的法定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後，則屬後者。

三、總統制的設立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五日，戈巴契夫當選蘇聯首任總統，這是蘇聯政治體制一項重大變革，也是戈氏推動黨政分離一大里程碑，依戈氏構想中的蘇聯總統制，既可打破舊的國家政治體制架構，為蘇聯政權尋找合法性基

礎，藉以鞏固個人權力地位；另一方面則是欲改變西方國家對蘇聯觀感，予人以蘇聯已走向西方民主政治之路，以爭取西方經援。與此同時，戈氏設立了「總統委員會」這個組織與功能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類似，主要任務是提供總統制定有關蘇聯國內外重大政策方針建議。戈氏希望以這個機構取代共黨中央的政治局，成為蘇聯最高權力決策中心。

總統制的建立，使蘇聯的行政權與立法權分開，並與司法權鼎足三立，蘇共不再控制政府行政部門，共黨黨內保守派影響力與對「改造」的阻力也急速消滅，蘇聯決策大權由蘇共中央政治局轉移到總統及「總統委員會」。

四、人事政策

俄羅斯民主制度的發展過程中，有關幹部政策的改革是一大重點實務。戈氏透過對幹部政策的「公開性」和「民主化」，將蘇共行之有年的「職官名錄」(nomeklatura)制度全盤取消，對人事晉用管道，代之以在全國人民的監督下，以公開性和民主化原則行之。他擴大各種職務的選任制和徵選制，加強人民群眾的輿論監督作用。從地方黨組織、蘇維埃組織開始，逐步實行無記名投票和差額選舉，最後還規定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領導成員，包括總書記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在內，任期均為五年，連選以連任一次為限。戈巴契夫企圖通過對幹部政策民主化的進程，使有助於推動政治上的民主化。

戈巴契夫在推動「改造」工作初始，對「改造」方向與道路而言，與中共同屬「摸著石頭過河」。因此直迄一九八九年戈氏訪問中共，親眼見到天安門事件後，他才感到面臨幾條道路方向的選擇。第一條道路是持續由上而下的改革，如同東歐各國般，改革是朝破壞社會主義與共黨權威性統治方向前進。第二條道路是向人民顯示出維護社會主義體制的意志，對民主化運動進行武力鎮壓，重新確立共黨統治權威，如同中共處理天安門事件方式。但是戈氏認為蘇聯的改造道路，不應是往左的第一條道路，也不是往右的第二條道路，而是向第三條道路：在社會主義體制內的「改造」之路前進。他不願抹煞東歐或蘇聯朝民主改革之路已付出的心血，因此他繼續公開否定有限主權說，他希望在第一條道路和他自己選定的第三條道路之間，找出若干條連繫的小徑。但是對此小徑上的潛在問題，他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在連接第一條及第三條道路的小徑上，對蘇聯而言存在著既深且廣的深壑鴻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中共比較不成問題的民

族主義分離意識。

戈巴契夫在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改造過程中，並沒有增加蘇聯轉型期社會的政治凝聚力，社會經濟難題也未見緩和，反倒是東歐民主改革開放之風，迴轉吹回蘇聯境內，加速蘇聯共黨一黨專政的潰散。當戈氏窮於應付保守派與改革派衝突問題之時，他更忽視了第三個聲音——民族分離意識。而當他實行複數選舉，及修改憲法允許多黨制合法存在，一手將蘇聯人民從絕對世界導入相對的世界時，戈氏已一手把自己的政治傳統性權威與蘇共的法理性權威轉變成蘇聯政治文化的危機，最後在「八月政變」中，讓保守派和激進的改革派趁隙先後各擊出最具致命性的一擊。⁷

叁、俄羅斯的政黨發展

十年來，俄羅斯從一黨專政轉化成多黨制，朝著西方的政黨政治發展，其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多黨制形成期：（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一）

此時期係從戈巴契夫推動「改造」工作後，蘇聯社會出現數以千計的獨立性社團組織開始。這些社團組織中，部份具有政黨的性質特徵，例如一九八八年五月成立的「民主同盟」，聲稱是蘇共的反對黨。但是這種方式的民主，並非戈氏心中「改造」後的民主。戈氏的民主是希望將民主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從而復活列寧的社會主義，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均實行民主化，藉著列寧有關社會主義是人民群眾活生生的創造的說法，直接訴諸人民，鼓勵人民對公眾事務的積極參與。⁸基本上，這種參與只是在社會主義範疇底下，其目的是期望蘇聯人民能夠成為「改造」政策的後盾。⁹一則可以防止蘇聯政治文化所面臨的危機，一則亦可助戈氏建立其政權上的傳統性和法理性權威。唯其後「改造」步調的進展，戈氏無法完全掌控，尤其是多黨制的形成。

⁷ 葉爾欽在「八月政變」緊要關頭，雖然出手協助拉拔他的戈氏，讓戈氏暫時渡過了來自保守派的一擊，但是接下來，在戈氏更需要葉氏傾力支持之際，葉完全棄戈而去，這才是真正對戈氏最致命一擊。

⁸ Mikhail S. Gorbachev, op. cit., p. 24.

⁹ Allen Lynch, "Gorbachev's International Outlook: Intellectual Origin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ecurity Studies, 1989, pp. 29-31.

一九八九年七月，約二百五十位蘇聯人民代表於莫斯科召開會議，宣佈成立「區際人民代表組織」，主要訴求是加速改革，廢除憲法中保障蘇共法定領導地位的條文，提倡政治組織結社的自由。一九九〇年時，蘇聯境內的政黨組織先後成立。其中較著者如「人民陣線」、「民主聯盟」、「社會民主黨」、「俄羅斯基督民主黨」等。同年蘇共二月全會及三月蘇聯第三次非常人代會決議，正式通過修改憲法第六條，承認業已存在多時的多黨制現實。是年十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蘇聯社會團體法」，正式立法准許人民有結社的權利，自是蘇聯政治向多黨體制過渡。

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後，戈巴契夫宣布解散蘇共中央委員會，正式結束蘇共一黨專政的歷史。

俄羅斯政黨發展在這個時期可以形容是多而雜亂。多就是各類政黨、組織和運動為數眾多將近千個。一些非正式組織轉化為政黨之時，又出現許多新的政黨。較具影響力的則大多係由蘇共中分裂脫離出來的民主派政黨，如副總統魯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的自由俄羅斯人民黨、和民主綱領派成員所組成的俄羅斯聯邦共和黨。雜亂就是政黨組織形式與主張活動五花八門。有主張回到傳統、反對任何改革的，也有要求走西方道路、全面改革的。更有利用各種社會或宗教力量，積極介入政治活動的。遠較十八世紀六〇年代斯拉夫派與西化派之訴求更為令人眼花撩亂。一九九〇至九一年間，整個社會政治生活失去控制，以致政黨活動在無法可管理情況下，各政黨動輒走上街頭、集會示威，成為此時期政黨活動的主要特點。

二、政黨合縱連橫重組期：（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

隨著蘇共的解散和蘇聯的解體，俄羅斯在葉爾欽的領導下，展開了激進的經濟改革——「震撼治療」。但是領導階層在國家發展道路與體制問題上發生了連串激烈爭辯。議會中各黨團常因著不同的議題產生不同的爭論焦點，隨議題來的就是政黨成員不斷重新改組整合，這股風氣漫延到社會各種政治性組織與政黨內部。

這一時期以葉氏為首的行政機關和議會議長哈斯布拉脫夫（Ruslan Khasbulatov）為首的立法機關為主，這兩大權力機構之間的鬥爭曾有過幾次高潮。第一次是一九九二年四月俄羅斯第六次人代會，對憲法草案之爭，哈斯布拉脫夫所提立憲思想戰勝葉氏的總統制草案。第二次是九二年年底第七次人代會上，雙方爭執結果葉所支持的蓋達爾（Gaidar）政府被撤換下來。第三次是一九九三年三、四月第八次人代會，葉的憲法草案再

度被否決，葉所發布的特別治理令也被迫修正。其後的全民公投，雖然葉的經改政策獲選民認同，但選民同時也希望議會代表繼續留任。第四次是九三年十月的葉氏砲轟國會事件，葉以強力手段解散前蘇聯時期留下的國會，繼之於十二月辦理大選。這一時期各政黨在合縱連橫情形下集結成兩大勢力相互對峙，支持政府葉氏的民主派系與反對政府的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派系在議會中旗幟鮮明對立，連社會運動也遙相呼應十分明顯。

三、新議會時期：（一九九三迄今）

十月流血事件後，俄羅斯政黨發展被迫重新組合。因為包括俄羅斯共產主義青年聯盟、軍官聯盟、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救國陣線等左派與民族主義分子的政黨，因為參與對抗政府，被葉氏下令暫時停止活動並取消部分主要分子的競選議員資格。除了副總統魯茨科伊、議長哈斯布拉托夫被囚禁而不能參與政黨活動外，連俄羅斯人民黨、公民聯盟等較中立性的政黨發展也大受影響。唯九三年十二月的大選活動，反而促成了俄羅斯政黨組織重新洗牌，出現「優勝劣敗」的淘汰進化現象。

大多數政黨為了參與選舉，均重新再度整合，並且提出更為明確的競選綱領。例如「俄羅斯選擇」、「俄羅斯統一和諧黨」和「民主改革運動」是以一批高知名度者為骨幹，以民主改革為口號，支持葉爾欽。而「俄羅斯自由民主黨」是以恢復大斯拉夫主義等極端民族主義為競選綱領。「俄羅斯聯邦共產黨」「農民黨」則以重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為訴求。那些既無明確訴求，又乏高知名度者之支持的政黨或單一候選人，紛紛中箭落馬。

選舉結果，在全部國家杜馬四五〇席中，親葉爾欽派共獲一六四席，反葉爾欽派共獲二一〇席，餘為中間派人士。依此計算，反葉派占47%、支持葉的占37%，中間派15%。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吉里諾夫斯基（V. Zhirinovsky）領導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得票率達22.8%，出人意外之高，正足以反映出俄羅斯人民對找回失去的民族自尊相當強烈。相對的，蓋達爾為首的「俄羅斯選擇」得票率僅14%，遠低於選前所估計的，可見選民對「震盪療法」已失去信心與耐心。唯對政黨政治發展而言，這一次的選舉，促進了俄羅斯民主政治穩定的、持續的發展，則是可以相當予以肯定的。

肆、俄羅斯政治民主化的困境

俄羅斯經多年來形成目前多黨制的政治體制，雖然政黨本身尚在成長過程中，但是基本上，已初步確立其西方式的政黨政治雛型，議會道路已成爲各政黨參政的熱門途徑。但是在俄羅斯政黨發展過程中，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仍充滿了荊棘。

從過去十年來俄羅斯政治發展的經驗，證明有些學者的觀點：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個專制政權遠比革命成功後建立民主制度容易些。¹⁰戈巴契夫企圖在蘇聯同時進行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改造」，但是對久經桎梏的俄羅斯社會和人民而言，這兩項鉅大工程均尚未準備好，民衆雖驟獲解放，初多不知民主爲何物也。雖然俄羅斯的文化、藝術、音樂的發展深厚，但在政治理論發展和一般民衆對民主政治的素養上，連吸取西方政治傳統都跟不上腳步，何況俄羅斯境內尚有許多政治學者與政治人物還都普遍對西方觀念採取排斥態度，因此欲在短期內形成一個多元且有秩序的市民社會並非易事。

蘇聯解體後，許多俄羅斯人仍和十九世紀時一樣認爲「民主」一詞等於「好的社會」，它可藉由有民主素養的政治人物達成，這種觀念使許多俄羅斯人將國家達成民主的希望連接到葉爾欽個人身上，連對一九九三年十月炮轟國會事件也視若無睹。間接的，自然使俄羅斯人民將希望寄託在葉氏身上，形成新的威權政治領導。

但是也有一部份俄羅斯人緬懷偉大蘇聯帝國的過去，將此情感投射到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的大選中，他們發現一個新的民粹主義人物吉里諾夫斯基，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的領導人，大選結果該黨獲國會多數席位。另外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亦獲13%選票，僅次於俄羅斯選擇黨與自由民主黨。因吉氏主張極端民族主義，對俄羅斯通往政治民主化之路潛伏相當大的變數。此種情況正如某一位政治學者所言：「當大衆企圖將權力和威權轉移在一位領袖或一個政黨時，無論是用如何無懈可擊的民主方法，都是一項大衆缺乏民主素養的證明。」¹¹

另外，不可忽視的是，俄共在俄羅斯聯邦各共和國、邊區、省和自治區等八十八個行政單位中，仍有二千多個區級黨組織，二萬多基層組織，黨員超過五十萬人，是俄羅斯聯邦最有組織、最大的一個政黨。¹²這一股力

¹⁰ Vera Tolz, "Problems in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Russia", in *RFE/RL Research Report*, vol. 3, No. 9, 4 March 1994, p.1.

¹¹ Ibid.

¹² Pravda, Jan. 24, 1995. p.1.

量，高唱社會主義和大俄羅斯的愛國主義，主張以合法的手段奪取政權，積極將原蘇共的組織重新整合起來，而且這現象對原擁有一千九百萬黨員的蘇共而言，只是冰山下之一部分，常被人忽視。¹³如果假以時日，俄共若能將所有支持共產主義的政黨整合起來，則列寧所謂「民主百萬倍」的政黨重新執政仍不無可能。另外再觀諸大選後，國會農民黨、自由民主黨與俄羅斯共產黨三大黨聯合支持立場較溫和的農民黨成員芮布金（Rybkin）出任下院國家杜馬的議長，這股實力之整合也是不容忽視的。

一九九三年年底俄羅斯公民投票通過的新憲法，授與總統的權力比美國、法國的總統權力還大，總統除擁有美國總統所擁有的權力外，他還有監督憲法的遵守；保證國家權力的正常行使；解散國家杜馬；決定舉行全民公決；任免總理和其他政府成員；主持政府會議等權。當國家杜馬提出對政府不信任案後，總統可宣佈政府總辭或改組，但總統本人不必辭職，這種一手掌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權的憲政設計，正如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 Brzezinski）評語：「葉爾欽總統的極權主義傾向，使得建立民主俄羅斯的新憲法變成一份能夠輕易用來使個人獨裁合法化的文件。」¹⁴如果觀諸葉爾欽最近發布命令，俄羅斯聯邦中央政府可任免所屬各地方官員。若由葉氏掌控龐大官僚體系的人事派任大權，則更讓人擔心總統權力的過度擴張，恐有導致走向挾憲政之名行個人威權統治之實的憂慮。

在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過程中，大眾媒體的影響力具有一定地位與作用。基本上，俄羅斯的媒體享有和西方國家類似的自由。但主要的傳播媒體仍然掌握在政府當局手中。其中有多數媒體在社會經濟轉型過渡期間因經濟因素，轉而尋求政府單位的資助，其本身專業水準又不夠，乃成為政治鬥爭的戰場。部分記者因新聞報導與立場問題，也常遭到黑白兩道壓力，甚至犧牲生命。¹⁵這種現象對政治民主化過渡期的俄羅斯而言，是一不容忽視的潛在殺手。在戈巴契夫任內掌管意識型態的政治局委員雅可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早就指出「電視形象決定一切」，所以他本人身兼公視奧斯坦金諾（Ostankino）台負責人。包括俄羅斯在內的獨立國協體成員人民收看該台的人粗估也有二億人，今年三月十七日俄羅斯商業報曾

¹³ Moscow News, No. 3. 1992, p.14.

¹⁴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remature Partnership", in *Foreign Affairs*, U.S.A., March-April, 1994, p.67.

¹⁵ 莫斯科共青團報軍事記者霍勒得夫於1994. 9月被炸彈炸死。俄羅斯公視台記者李斯提耶夫於1995. 3. 1.晚在宅前被槍殺。

指出，「誰控制奧斯坦金諾誰就能控制俄羅斯」。¹⁶葉氏上台後也深知箇中重要性，故在九三年十月事件後，以當時該公視台負責人未盡力為葉政府做好宣傳工作為由，再次任命雅可夫列夫回任該公視台負責人，大力重新整頓，可見該公視台在俄羅斯邁向民主政治轉型期間角色之重要實不容忽視。

政治發展就是建立穩定的民主體制，但其先決條件是民主，而更先決條件則是要有足夠的收入與財富。比較世界各國可證，高度工業化與高收入國家經濟力的成長是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如此才能有受過教育的選民。¹⁷這一點連葉爾欽也不否認，他最近接受美國時代雜誌記者訪問時就坦承：「民主的基本條件是要有穩固的公民社會、中產階級和法治文化，但這些先決條件在俄羅斯才初具雛型。」¹⁸但是俄羅斯社會治安、經濟發展持續惡化，加上出兵車臣事件，使社會經濟雪上加霜。民衆生活若在短期內仍無法改善，則民主政治發展變數仍多。

葉爾欽近來多次表示將如期於明年舉行國會與總統大選，在憲法賦予總統龐大權力情況下，對俄羅斯未來能否順利步向政治民主化之路而言，明年舉行的總統選舉將是頗具關鍵性時刻。¹⁹

前俄羅斯代總理蓋達爾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公開表示，他所領導的「俄羅斯選擇」黨將不支持葉爾欽競選連任，此對葉氏而言是一危機警訊。因此葉氏旋於五月十二日幕後支持總理契諾米爾丁（Viktor S. Chernomyrdin）組「我們的家俄羅斯」政團，成員遍及現任政府各階層官員、大企業家，並預計於六月中旬擬定參加下屆國會大選名單。²⁰但據報導前述屬農民黨的國家杜馬議長芮布金（Rybkin）也聲明將另組政團投入年底選舉，如果此舉屬實，則俄羅斯將形成似英、美等國兩大政黨形式。筆者認為對穩定俄羅斯政局及邁向成熟的政黨政治與政治民主化將會有所助益。

16 Robert W. Orttung, "Yeltsin and the Spin Doctors", in *Transition*, Vol. 1, No. 8, 26 May 1995, p.11.

17 Russett Bruce & Starr Harvey, *World ploitic*,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3rd ed., 1989, p. 440.

18 "Heading for The Summit", *Time*, May 8, 1995. p.74.

19 假定一九九五年底國會改選結果，情勢顯現將不利葉爾欽等改革派明年的總統大選，則葉氏或有可能不顧誠信，將明年總統大選延後舉行，變相延長自己任期，則此舉將損及俄羅斯民主化。

20 Rossiiskaya gazata, 13 May, 1995, p.1. 另依俄羅斯聯邦選舉法規定，政黨必須在選前六個月成立並登記，始得以政黨名義參選，享有不分區代表名額。

伍、結 語

二十世紀中，俄國兩度使全球局勢發生鉅大的變化。首先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造成人類社會經濟、政治與意識型態上兩大陣營對抗情勢。其後是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上台後展開的「改造」工程，加速全球人類社會朝向市場經濟與政治民主化的共同道路。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復出後，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方法，大力推展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而稍後同時，蘇聯的戈巴契夫也繼之以「多一些社會主義」的方法，從事蘇聯的「改造」，其目的都是要「使社會主義體制恢其應有的生命力」。²¹但是戈氏的多一些社會主義強調社會生活中多一些民主化、公開化，中共則避免觸及政治問題，更未強調「民主化」「公開化」，戈氏則在強調「民主化」之後下台，蘇聯也戲劇性的解體不見了。俄羅斯在「改造」十年後的今天，社會各界熱烈討論「改造」的利弊得失。支持改革者推崇戈氏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改革者」，老共產黨員則罵他是叛徒，褒貶互見。但是戈氏帶領俄羅斯人民向政治民主化邁出了最危險與最困難的一步則是不爭的事實。

史達林強調列寧的黨是意志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存在。事實上，共產黨內部從來就不會消滅過派別組織，廿八大時的派爭尤為激烈。這似乎也應了馬克思的辯證法論點。他認為變動中的事物，矛盾永遠存乎其中，而且因矛盾所生的磨擦衝突鬥爭，是永遠存在的。因此無論是由特殊材料製成或是具有特種性格的共產黨員，²²也是無法逃脫此項規律，而蘇共一黨專政也是在這種變動規律的危機中掙扎著。當戈巴契夫大力推動「改造」工作之際，上千個打著「民主派系」的獨立社團組織已出現在一黨專政下的蘇聯社會。其後當蘇聯共黨政權突然解體之際，這些組織團體，乃更急欲尋找出新社會制度的支持依據，因為原先他們的出現存在，係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體制下，基礎相當脆弱。正如同自前蘇聯獨立出來的俄羅斯聯邦，在蘇聯解體前一年它必須重新評估其政治參與的角色一般。十年來的俄羅斯社會，就如同俄國人自己說的，它是一個缺乏明確社會結構型態的

²¹ Maikhail S. Gorbachev, *op. cit.*, p.32.

²² 見史達林「追悼列寧——一九二四年一月廿六日在第二次全蘇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列寧文選*，第一卷，二五頁。

「不定型」變遷的社會，國家社會發展目標是隨時在異動之中。²³在破壞舊的傳統制度後，新的體制尚未建立起來之前，是體制最脆弱的危機時刻。²⁴此時期的政治參與，係在社會變動危機中和國家形成過程中，這二者之間，充滿了折衷、不規則以及抽象不明確感，十年來俄羅斯的政黨政治發展就是如此。

十年的改革結果，俄羅斯經濟雖迄未見好轉；人民生活仍然困苦；政黨發展與政治民主化仍充滿變數，但是在這期間俄羅斯的努力卻不容否認。當前西方國家尤其寄望俄羅斯人民仍將繼續在葉爾欽的帶領下，朝向建立政治民主化的既定方向前進。

但是許多俄羅斯和西方的政治觀察家，擔心俄羅斯的民主化危機主要在於新憲法所賦予總統的權力，因為假定過渡轉型期的民主化改革需要賦予總統非常的權力，也假設葉爾欽是一位具民主理念而且相當理性的政治人物，但是誰也不能保證日後他的繼任者不會濫用憲法所賦予總統的龐大權力。其次他們也擔心俄羅斯人民對於主張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支持，如果社會經濟持續惡化，以致加深人民緬懷過去歷史情結²⁵，則此股力量加上原蘇共廣大的一千九百萬基層黨員與組織力量若再度整合成功，那將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危及民主改革的龐大陣容。

在探討俄羅斯政黨發展與政治民主化之餘，吾人理解過去十年來，蘇聯的黨國不分、一黨專政體制已抵擋不住全球民主化浪潮。在戈巴契夫與葉爾欽的銳意連續改革下，俄羅斯基本上已邁上政黨競爭的民主政治道路。在這股巨大浪潮下，筆者深信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更將是海峽對岸中共一黨專政命運的終結年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亟應趁此機緣，共同努力，要求兩岸當局共同攜手，全盤放棄任何有關違反民主化洪流的體制、措施，以期海峽兩岸人民早日共享民主自由福祉。

*

*

*

(校對：陳靜萱、張國政)

²³ Marcia A. Weig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arty Formation in Russia, 1985-1992: Institutionalizing Democracy?", in *Russian Review* Vol.53, April 1994, p.240.

²⁴ E. A. Rees e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in Diasar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2, p.124.

²⁵ *Izvestiya*, July 1, 1992, p.2.